

書名：《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從詩文評到文學批評》

作者：張健

出版：臺灣政治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1月

頁數：336頁

中文世界的學術史寫作，倘不遠攀《莊子·天下》，從黃宗羲《明儒學案》算起，至今也有三百餘年的歷史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對近現代中國學術演變、西潮東風的探討，亦駸駸頗為顯學。作為“關於研究的研究”，一部好的學術史著作，其意義恰恰不止於“學術史”價值，而應在其“學術”價值——換言之，要在透過往跡前塵，揭示出歷史窳節關鍵中蘊含的學理真諦。欲達乎是，則作史者非對所論之“學術”本身具有深厚積累、洞見卓識不可。業師張健先生新推出之專著《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從詩文評到文學批評》，便是一部建基於古典文論專業深耕的學術史力作。惟因作者於中國古典詩歌史、詩學史本身具有長期功力與獨到見解，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大“學科內部問題”方在其考辨之下“如鏡照形”，毫釐畢現。

本書是作者2010年以來研究中國文學批評之現代學術史的成果彙集。書名取自朱自清文學批評研究“自當借鏡於西方，只不要忘記自己本來面目”的主張。全書主要包括前言和正文八章，前言總述全書要旨，第一章至第三章從觀念上討論現代學術精神、西方“文學批評”觀念以及“純文學”觀念之輸入，第四章至第八章則圍繞朱自清、郭紹虞、羅根澤、錢鍾書的中國文學批評研究展開。張先生指出，作為現代學科的“中國文學批評”，乃是五四以後中國學者持西方文學批評觀念整理傳統“詩文評”的產物，其觀念基礎在於：文學與學術皆具有普遍統一性，接受代表此普遍統一性的西方學術，中國學術才能獲得現代意義。正因如此，中國文學批評的研究中，必須處理中國傳統與西方觀念之間的問題。現代學者主要以三種途徑應對之：（一）以西方文論框架，納入中國

文論材料,以楊鴻烈《中國詩學大綱》、傅庚生《中國文學批評通論》為代表;(二)採用西方文學批評的觀念劃定研究範圍,而不用其理論架構及術語,嘗試建立中國文論自身系統,以朱自清《詩言志辨》以及郭紹虞、羅根澤的兩種《中國文學批評史》為代表;(三)不取中國或西方本位,中西平等互相詮釋,以錢鍾書《談藝錄》為代表。張先生認為,上述三種途徑各有得失,第一種易於現代人理解而失去了本來面目,第二種保存本來面目,而未能實現真正的現代詮釋;第三種因其不立系統,難見中國文論之整體。此外,國粹派以來提出的文化民族性問題,也長期滲透在現代中國學術之中。中國傳統能否成為現代學術的基礎?中國學術的現代化能否有另外的途徑?這些是中國現代人文學的重大問題,在今後還需深入探討。

一、反映與透視：學術立場下的本來面目

本書題目所用的“本來面目”,乃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術語。此語源出於禪宗話頭,在現代學術史上的內涵,則是與西方相對的中國文論自身的特點,即朱自清所說的“自己本來面目”。不過,名以“本來”,而非“國粹”“本位”等等,背後似乎也蘊含了一重潛在的立場:此種探討的目的在於學術求真,而非從狹隘的民族性立場出發、故步自封。從觀念的角度看,之所以分別中西,其出發點並不是政治的,而是學理的。掃拂“東方主義”式的遮蔽,破除“以西律中”的桎梏,方能發現中國文學批評的真相。在這個意義上,無論中土耆宿抑或泰西學人,凡治以中國為對象之學問,都需以見其“本來面目”為鵠的。學者本人固然有其國籍、民族、文化認同,但在面對具體的問題時,其立場應當是學術的。如此才可以超越口號式的提倡,進入切實而深細的研究。張先生此書的論述中,朱自清的中國間架,以及錢鍾書的中西互詮,都區別於晚清國粹派與民國本位文化派,或正有意於此也。

在這種學術求真的立場之下,“本來面目”的含義就有兩個層面,一是“將中國還給中國”,二是“一時代還給一時代”。相對於易受關注的第一層,本書第四章特別揭示了第二層含義。張先生舉了辭令時代、散文時代等例

證,說明朱自清“一時還給一時代”的具體內涵(頁145—147),並且敏銳地指出,這種思路受到胡適“整理國故,必須以漢還漢,以魏晉還魏晉……以程朱還程朱,以陸王還陸王,各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方法正相一致,可以上溯到段玉裁以孔還孔、以鄭還鄭的“校經之法”(頁137)。“本來面目”不僅僅是中國的面目,更須認識到中國傳統本身的歷史性與複雜性,而不是將其視為單一、均質的存在,這一內涵很值得讀者深思。事實上,本書的研究,同樣也是這種方法的體現。例如第二章對西方“文學批評”觀念輸入中國過程的考察,以知識考古學的方式仔細對讀莫爾頓《文學的近代研究》英文原著、中文譯介以及陳鐘凡《中國文學批評史》,論證了陳氏的文學批評知識乃得於胡愈之、胡夢華的中文譯介,然其僅標英文著作,恰恰折射出奉西學為權威的心理(頁101—104)。第三章探討純文學、雜文學觀念框架的形成,亦是基於對戴昆西、太田勝男以及黃人、謝無量等有關著作的爬梳考索(頁114—124),可謂“以英還英,以日還日,以中還中”的典範研究。西學東漸乃現代文化史上的一大題目,近乎人能言之;但籠統含混、對影聞聲的認識並不能對我們深入理解中西學術帶來益處。本書經過一番源流考鏡,學術史的真相遂被澄清洞明地“反映”出來。

更可言者,本書對學術史的“鑒照”,又絕不限於事實反映而已,而是帶有作者眼光與見解的“透視”。充分展現歷史本相,目的在於“目有全牛”而“切中肯綮”,亦在於以“同情之理解”作出恰如其分的評斷。例如第二章指出楊鴻烈套用西方理論的做法並不成功(頁98),其原因或即在後文提出的一個尖銳問題:“如果‘外來的意念’發生了變化,那麼中國文學批評史是否就要重建?”(頁216)又如第六章指出羅根澤批評史未能在具體論述真正建立基於自己見解的一套系統,但也公允地肯定其問題史的體例模式“能夠比較清晰地梳理出某一體裁理論及某一問題理論的脈絡”(頁251)。第七章、第八章對錢鍾書文學批評研究的成就多有激賞,而亦不忘指出錢氏以中國文學不存在統一“文學”觀念的論斷“不盡符合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客觀事實”(頁280)。在本書冷峻客觀的論述的背後,讀者事實上也不難聽到作者擲地有聲的論斷,這些張先生有關學術研究方法論的觀點,也是本書學術價值的重要方面。

二、望遠與顯微：寓問題於案例的寫作方法

本書在寫作上的一大特點，乃是以現代文學批評重要學者的經典著作為中心。這本是自《明儒學案》及錢穆《近三百年學術史》以來的傳統。不過，在知識爆炸的當代，或許出於資料的激增，以及對論題覆蓋面和整體性的追求，以問題為中心的撰述模式日益普遍。如果說從“面”展開的問題史，可以類比“望遠鏡”；那麼以“點”為中心的專家論，則可擬乎“顯微鏡”。誠然，不同的體例對於處理不同層次的問題各有勝場，未可隨意軒輊；不過本書的一大意義，或許便在於展示了“顯微”式研究的活力與功力。簡言之，個案研究的進路，並未削弱本書對宏觀議題的觀照，反而以提綱挈領的方式，讓讀者更易把握到現代學術史的關鍵與大勢。黃宗羲《明儒學案發凡》云：“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對諸家“宗旨”的精確提煉和深細闡釋，正是張先生此書的貢獻。

以“顯微”而“知著”，首先有賴於對“焦點”人物與著作的選取。本書重點討論的朱自清、郭紹虞、羅根澤、錢鍾書，皆是在學術史上影響巨大者，其中朱自清之說係本書總題之來源，郭、錢二氏則分別有兩個專章探討（第七、八章論錢；除第五章論郭外，第三章論純文學、雜文學問題，潛在的中心人物也是郭），尤可見張先生的學術眼光。表出錢鍾書在文學批評學術史的重要性，則尤為特識。在這些人物之外，胡適在多章中也被提及，或也可視為文學批評學術史“幕後”的重要人物。其次，在焦點之下，本書實際上是有宏大的視野作為背景的，乃是將對“問題”的慎思明辨，潛在融化於案例的具體分析之中。例如從朱自清入手，關心的是中西關係、理論體系性的問題；圍繞郭紹虞，展現的是純文學、進化論這兩大核心觀念進入中國文學批評的問題。這種專著、人物與問題的錯綜，保證了研究的立體性。其三，個案研究使得本書能對各學者的具體學術觀點實現工筆細描般的詳盡展開。例如第八章對錢鍾書《宋詩選注》中詩學觀念體系作了精彩的闡釋，提煉出直接感受、不隔、意脈通貫、體格、修辭技巧、神韻、創造性七者作為“好”詩的標準，各目中率多左右采獲，徵引《談藝錄》《容安館札記》等著，以錢注錢，不啻重構了錢氏心目中潛在的詩學批評體系。本

章分析《宋詩選注》列序之法,指出其著眼的是詩學脈絡與詩體,而非詩人生年先後(頁296—297),尤為發幽闡微的賞音之論。其四,跨學科的學術視野恰恰在個案分析中得以更有效的展開。在現代學科建立的過程中,文學研究面臨的核心問題多非孤立,而與其他人文學術頗有共通之處。全面覆蓋這些影響關係,在論述操作上是較為困難的。本書從朱自清等學者的個案中發現具體問題,再通過閱讀史的考察引入馮友蘭之哲學史研究做旁證,這樣不但切實有徵,而且文學或哲學兩端均能“直入塔內”,不流於空泛或隔膜。換言之,跨學科同樣也有個“本來面目”的問題。張先生此前在《知識與抒情:宋代詩學研究》中論述理學與詩學的關係,同樣也顯示出這種特點。

三、全息與剪影:如何探索文學理論的普遍系統?

本書在綿密的歷史考辨之上,引出了對文學批評學科內部問題的思考。文學理論的系統性及其形式表現,便是其中一大要害。胡適嘗有中國古代兩千年來僅有《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數部精心結構之“著作”的大判斷,影響民國以來人文學界甚巨。張先生對朱、郭、羅、錢著作的評價,理論之系統性也是其核心關切之一。本書對系統性的看法,大端有二:其一是援引馮友蘭之說,區別了內容實質的系統與表達形式的系統,中國傳統學問缺乏形式上的系統,但并非沒有實質上的系統,因此今人可以通過現代方法整理、表述出傳統學問之系統。本書有關錢鍾書文學觀念系統的論述,也是以這種劃分為基礎。其二則是對系統獨創性的重視,即理論系統須出於學者自身的心得體會,對研究對象建立一套獨立、有創新性的看法,而不能來自“襲取”。本書對文學純雜觀念框架之淵源做細致的歷史考察,以及對羅著批評史體例的評斷,其根本皆在此。事實上,大量看似“系統”的文學理論著作之所以在時過境遷後失去價值,其癥結也正在於此。

或可進一步追問的是,如果說任一可以成立的學問都有內容實質之系統,那麼,表達形式的系統是否有其必要?換言之,對形式系統的講求,是否係對“現代學術”的“迷思”?錢鍾書自己說“許多嚴密周全的思想和哲學系統”都

如龐大的建築物在時間的銷蝕下垮塌,余英時也嘗針對所謂錢氏“散錢無串”的批評,指出“與其用不牢固的繩子把散錢勉強串起來,不如讓錢散置地上,一錢有一錢的用處”。那麼,錢鍾書之不立系統(形式系統),是一種權宜之計,抑或是某種學術理念下的必然選擇?人文學術之研究,自然須以“采銅於山”為根基,厚積功夫而終至“豁然貫通”。那麼,在學術表達形式上,是否可以效法錢鍾書,不立系統,而是以“剪影”見“全息”,於一鱗半爪之間真龍自在?這是值得當代學者思考的問題。

此外,有關理論的民族性問題,錢鍾書之“不立系統”與“不取本位”,是否存在學理上的聯繫?世界各民族、各文明因其語言、歷史的複雜差異,各有其文學傳統,自然也各有其文學觀念或理論的系統,這可以說是一種有本位(客觀學術意義上的本位)的系統。就某文化內部而言,因其實質系統而建立形式系統,似乎至少在操作上是可行的。然在跨文化的語境中,由於概念、命題等方面的重大差別,以及研究者學力的限制,理解實質系統或是建構形式系統,都有較大困難。跳出某一文化的本位之後,“系統”是否可能亦成爲一大問題。事實上,對中國文學固有理論體系的總結、發明,雖在朱自清、錢鍾書等已經開創,但彌綸群言、通觀衢路之作,似乎至今仍付闕如。由此更上一層,如果有了對某一民族/文明之文學理論系統的充分瞭解,我們如何可以達到普遍的文學理論?在這個意義上,特定民族文學理論與涵蓋全人類的普遍理論之間,也可以類比爲“剪影”和“全息”的關係。較保守的立場或許是尊重歷史傳統,建立複數的“文學理論”(literary theories),而將統一的文學理論(universal literary theory)留待將來自然形成。但這似乎只是延緩了問題。近代以來在國際政治文化形勢下既有的對“普遍理論”的追求,或多或少是帶有一定文化霸權的“競爭”和“篩選”,淘汰了某些弱勢文化的話語,或是以強勢文化之理念節取、規訓之。在這種競爭一篩選模式之外,我們應如何探索一種可作爲跨文化對話基礎的“普遍理論”或“世界文學理論”?是地負海涵、取其“並集”?抑或砥礪攻錯,得其“交集”?又或在歸納不同體系的基礎上,抽象生發出新的、更高層的概念和命題與體系?並集模式便於操作,但也有汗漫無歸之虞。交集模式可以保證理論體系的簡潔有效,但卻可能遮蔽不同文化的豐富性與複雜性。抽象

模式則對學者的語言能力、思辨水平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競爭篩選、並集加和、交集疊合與抽象提升四種模式之外，是否還有其他路徑？這都有待世界各國學者紮實的研究與積極的交流，在實踐中繼續探索。《借鏡西方與本來面目》的探討，實際上為當下的文學理論研究提出了銳利而重大的方法論問題。張先生此書內容宏富，考辨精確，思理深細，本文謹為鈎玄提要，難免刻鵠畫虎之譏，讀者當深入原著的多棱寶鏡之中，必能收穫極大的啟迪。

（作者：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 胡 琦）